



名人侃“下海”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名人侃“下海”

朱铁志 赵 光 主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京)新登字 097 号

名人侃“下海”

朱铁志 赵 光 主编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

北京慧声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毫米 32 开 9.25 印张 207(千)字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100 册 定价:5.60 元

ISBN 7-5043-2633-x/G · 954

前 言

市场经济正以异常迅猛的来势，冲击着旧的文化体制、价值观念，以及传统的一切。在喧哗与骚动面前，文化人也受到强烈震撼。是矢志不移，还是舍身“下海”；是固守清贫，还是弃文经商，成为现实而迫切的问题。

为此，我们邀约老中青三代文化人畅谈感想。一个月后，各类稿件纷至沓来。其中，慷慨激昂者有之，顿足捶胸者有之，破口大骂者亦有之。但不论褒贬、扬抑，亦或瞻前顾后，左顾右盼，无不言之成理、情真意切。

读罢这批稿件，我们深深感到文化人对自己所衷爱的事业那份浓浓的深情；也分明体会了郁结于他们心中的那份大雾似的困惑。中国的文化事业究竟向何处去，中国的文化人到底该怎样活，这确实是个问题，也正是我们选编这本书的根本动机。

感谢为本书撰稿的几位老同志，他们不仅踊跃赐稿，大力支持；而且出谋划策，代为约稿。没有他们的帮助，编辑本书是很困难的。

同样要感谢所有为我们撰稿的朋友，没有大家的鼎力相助，本书同样不能在短期内“竣工”。

囿于联络条件的限制，部分选自报刊的文章未能与作者和编者联系上，敬请谅解。

编 者

1993. 5.

目 录

前 言

王 蒙：文学与市场	(1)
陈荒煤：把作家推向什么市场？ (外二题)	(7)
于光远：我也来谈谈“下海”	(19)
何满子：望海独白	(23)
冯英子：我决不下海	(25)
邵燕祥：忽然想起	(29)
蓝 翎：逗跳骚	(32)
舒 展：隔岸观“海”录	(37)
于浩成：徒有羡鱼情	(43)
方 成：岸边絮语	(48)
唐 挚：同行的惶惑	(51)
从维熙：海水是咸的	(54)
阎 纲：老兄珍重	(57)
林 希：文人“下海”戏谈	(60)
白 桦：读画的画外心得	(67)
牧 惠：“公费医疗”到几时(外一篇)	(70)
袁 鹰：海就是海	(76)

臧克家：投向“大海”的一块小石子	(78)
杨匡汉：精神的归属	(81)
彭加瑾：教授卖馅饼小议	(85)
雷 达：由书摊引发的思考	(89)
刘 恒：在经商和写作之间 我还是选择后者	(94)
惜 醇：“下方且作自由民”	(96)
毛 琦：论文人经商	(98)
虞 丹：岸上人语	(102)
黄国柱：商海茫茫话批评	(103)
陈 飞：“下海”漫议	(110)
米博华：商潮之畔：公职人员的羞涩与焦灼	(114)
陆士华：商界世情	(122)
史占旗：望“海”兴叹	(125)
周克庸：文人“下海”与“入池”	(127)
郭庆晨：“下海”二题	(132)
丹 赤：“现代安贫说”质疑	(136)
李 辉：各走各的道	(139)
鄢烈山：“自救”亦自戕	(142)
甲 乙：海边乱弹	(145)
朱铁志：“海”边谈“潮”(外一篇)	(148)
光 夫：文人都能“下海”吗?	(153)
杨 群：文人“下海”的希望	(158)

叶延滨：“下海”两题	(162)
如 水：文人下海喂鲨鱼	(167)
商 正：“下海”与改行	(169)
肖复兴：犯不上较劲	(171)
南 帆：对话：文学与市场	(173)
吴口君：莫道文化不是“海”	(179)
谈成均：访问蒲松龄	(181)
卢凌日：从“下海”说开	(184)
郭宪周：红眼、水情及其他	(186)
赵国青：让人思考的点与面	(188)
黄心武：文星与财星	(192)
陈生洛：下也难，不下也难	(194)
金陵客：逼上梁山	(196)
劳悦轩：下不得海的夏德海	(199)
高洪波：铅字意象	(202)
韦 丘：市场经济与文学的联想、乱想 ...	(204)
张蕴真：知识分子下海有必要	(209)
马传景：要发财，快“下海”	(211)
邓忠强：由“教授卖馅饼” 论及“下海”	(216)
桑逢康：当心，别喂了鲨鱼	(220)
董乐山：也谈文人“下海”	(226)
安立志：非市场书价与格雷欣悖反 (外一篇)	(229)

余老樵：隔岸观“海”录（二篇）	(235)
赵德明：文化人，“下海”干什么	(242)
田长山：试图消解尴尬	(244)
白 丁：只想做个“俗人”	(248)
江励夫：文艺走向市场四题	(250)
张汉中：做文人与做商人	(259)
王 朔等作家侃“下海”	(263)
刘晓庆侃“下海”	(267)
张贤亮侃“下海”	(280)
“馅饼教授”侃卖馅饼	(283)
北林大校长呼吁：不要再让教授卖馅饼 ...	(285)

文学与市场

王 蒙

真正的文学家对于是市场经济或者不是市场经济大概没有超出正常的反应。汪曾祺就说：“面对市场经济，我无动于衷。”

这不是说他们不关心国家的发展或者经济建设，而是说他们对于自己的追求与使命的把握是很稳定的。因为他们之追求文学压根就不是为了钱。在任何社会经济制度下，搞文学而求直接获益，恐怕有点像是缘木而求鱼。做生意、炒股票、房地产……当然比卖小说赚头大得多。搞政治，做官，在一切社会制度下也比爬格子风光得多，威猛得多。钱是个好东西，但是钱的好毕竟是物质的好，而人需要的不仅是物质。许多非物质的东西是用钱换不来的，例如友谊、爱情、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真诚，再如从人缘到荣誉、地位、威信、国内外影响……都是仅仅用钱搞不来的，是无价的。无价的东西常常比有价的东西更显得珍贵。许多人有钱，但是并不幸福，他能获得的只是有价的东西却得不到无价的珍宝。

当然没有钱也是很苦恼的事情。

在某种社会体制下，权比钱还要重要得多。但权也不是万能；单纯的权可以使人怕你服从你趋奉你却很难使人爱你。权的妙处在于使人服从并从而建功立业，服从的结果往往要付出代价，人们对待你是以暂时的利益与心计取代真诚与平

等，权愈大愈听不见真话，这样的代价还不大吗？功业的考虑也常常挤掉常人的生趣。许多执权柄者其实相当孤独，更不要说他们的沉重的责任、紧张与风险了。一个艺术气质很重的人不会愿意为了权而放弃自己的文学，这是可以理解的，遑论钱乎？反过来说一个文人而又贪权迷财，把艺术型的疯颠激动嫉妒偏执与政客的勾心斗角野心勃勃与商人的唯利是图贪婪抠搜备于一身。那个形象可真够呛了，唉！

价值的追求应该是、实际上也是多元的。麦当娜挣的钱比总统还多，但是没听说哪位美国总统因而心理不平衡。麦当娜的价值可以表现在门票上，而总统的价值无法表现为年薪。脑体倒挂当然不合理，这个问题应该认真解决，但是即使在倒挂的情况下，搞原子弹的人的地位价值仍然不能与卖茶鸡蛋的人相提并论。做颅外科手术的医生与理发的师傅在人们的心目之中的地位也不会因为收入的倒挂而倒挂起来。通俗歌星挣的钱再多也不能取代受过正规教育的音乐家，反过来说，帕瓦罗蒂也无法取代猫王或者约翰·丹佛。不过二者并非半斤八两：在音乐之神面前，在追求艺术的人们面前，帕瓦罗蒂是“我的太阳”，而旁的星也就最多是颗星罢了。我们可以为作家的低收入而愤愤不平与奔走呼号，但是完全不必不可以作家的收入与歌星相比。眼睛盯着歌星的钱袋，殆矣！任何社会里，钱都不是一切，何况搞了那么多年的社会主义！

对于许多人来说，幸福是与大量的消费联系在一起的。消费型的人生观当然更重视钱一些。

但人们不仅有对于消费的追求。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更重要的目标是自己的建树，是自我的发展与完成，也是对于社会的奉献与功迹。当然没有基本的生活资料是不行的，不

吃不喝不花钱的人是没有的。但是在满足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以后，更多更多的钱，对于非消费型的人生观的保持者来说，确实是不屑一顾。他们宁可放弃诸多的物质财富与享受也要进行自己道义上的或精神上的追求。他们更看重自己的名誉、操守、事业、对于国家民族人类的义务乃至自己的个性趣味等等。他们绝对不肯为几个钱而放弃这些他们看得重的东西。仁人志士，自古有之，风流雅客，于今不绝；信仰原则，重于泰山，兴味乐趣，胜于生命；金钱何物，岂足挂齿？

如果一切是为了钱，那么钱又是为了什么呢？

凡是认真追求艺术、感受到艺术的魅力、感受到自己确实与艺术的真趣相通，感受到自己确实是在攀登艺术的高峰的作家，不但不会为了几许钱财而弃文下海，更大的诱惑也休想让他们动摇分毫。尝到过艺术的真味的人，就像尝到过革命的真味、宗教的真味的人一样，是会有一股子“邪”劲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来，凡是有这股子劲的作家，大体上是能写出或者已经写出点真玩艺来的。他们大多并没有市场经济一发展自己就如何如何失落了没用了货色卖不出去了之感，他们没有这种遭遇。他们照常写作，他们照常是“卖方市场”，约稿的催稿的在户外排着队，他们把全部心思用在写、写、写上还还不清稿债，他们听到种种关于市场经济的喊叫或者哀鸣，只觉得颇有些莫名其妙。他们不明白究竟是在咋唬个啥。谁饿了肚子？谁失了业了？一本书没有卖出去一百万册五十万册而是一万册两万册，不也是很好么？市场经济八字还刚开始划第一撇，大锅饭铁饭碗还牢牢靠靠地抓在自己手里呢？怎么就这么闹腾起来了？

有什么办法呢？人们选择了文学选择了艺术，人们选择了清贫与相对的寂寞，同时也选择了精神生活的高峰，选择了对于时间与空间的超越。人们应该有自己的矜持与自信。人们应该坚定一些。

有一些作家涉足于经济生活特别是商业领域。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作家当然也是要吃饭的。全世界仅靠写作就混得上饱饭的在外国是凤毛麟角，在我国有一批但也混得不太风光。一个作家除了爬格子另搞点进钱快的行当既不必悲壮也不必哀哭。完全用不着给自己的下海找出那么多冠冕堂皇的说法似乎是为天下作家树了样板。也用不着大惊小怪，生怕从此小说绝了种而人们被钱淹死，即使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也远远在咱们身后的身后，何必那么多超前忧患意识？

其实只要是人心未死，人情未灭，文学就不会灭绝。何况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大国文学大国！

真正跟得上时代的作家也是有的。比如王朔，他既能迎合市场的需要又能发挥他自己的个性，充分利用市场为他提供的活动舞台，包括维护市场运作中自己应该拥有的物质利益。大批的作家转向纪实文学，搞热点搞秘闻爆炸搞趣味，在满足读者的好奇心求知欲娱乐要求的同时也还能发表自己的见解主张，有的也还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当然也有较好的版税收入。有些作家在构思长篇小说的时候便考虑到电视剧的改编，以扩大影响增加收入，这也满好，他们对于市场经济的态度是如鱼之趋水，他们也不会在那里咋咋唬唬。

那么为什么还是真有一批作家同行面对市场经济闹嚷个不住呢？

一段时间，历史给人们的机会实在太少了。过去一个聪明能干雄心勃勃的小伙子或者大姑娘，他（她）能去干什么

呢？没有人给你分配下达任务你硬是什么也干不成。在绝对的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除了写小说写诗，几乎一切你都不可能尝试。一些人就是在无可选择的情况下才走到文学之路上来的——我早在十年以前就曾经著文提出“不要拥挤在文学的小路上”——他们压根就不安心老老实实在地搞创作。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为他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可能，他们怎么能不想去一试身手呢？他们愿意去就让他们去吧。祝他们成功。也许他们搞了一段下海又出海上岸，回来再写作，那也满好。祝他们返回以后写得更好。这是他们的自由，既不是方向也不是歧途，既不算弯路也不算必经之路，既不是样板也不是反面教材。

还有一些同行，写作的全盛时期已经过去。他们既做不到艺术高峰，岿然不动，我行我素，光辉自在；又做不到适应时代、追风赶浪、常新常鲜、畅销利市。他们的创作有点两头够不着。其实就是没有市场经济一说他们的创作上也会是不乏苦恼的。对于这些同行应该给予同情和帮助，也要善于听懂他们的时时发出的今不如昔的满腹牢骚。总是可以发发牢骚的嘛，这种牢骚有时候也能赶上点儿，变得可贵和正义起来；例如在需要宣布文艺界是重灾区的时候。人无百日好，花无十日红，写不出来就不写，不写比勉强写其实更伟大；大可不必看着年轻人写的东西不顺眼而生闷气。也不一定把罪过全推到市场经济上来。

其实谈谈市场经济对文学也有好处。追求金钱最多是俗鄙肉化；而追求整人——不论以多么伟大的名义——则是凶恶狼化了。考虑考虑有没有读者总比考虑写完发出来一篇作品会不会因此被扣上什么政治帽子好得多。过分注意市场即使一时降低了艺术品位也比为了臆想的政治问题而大批废绌

作家与作品好得多。毕竟是市场而不是非市场能够为作家提供更公平的竞争机会。毕竟是市场能带来更快的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使文化教育的发展也获得更好的条件。市场当然并非万能。我们除了市场还有精神还有文学还有道德还有传统。面对市场经济的起步，我们可以少安勿躁。我们不会失落自己。我们知道我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们知道我们能够指望什么，不能够指望什么。我们仍然是从容的。

把作家推向什么市场（外二题）

荒 煤

进入 1993 年初春，我也真没想到，突然有感而发，一连写了三篇短文章，都是谈作家“求生存”问题。

因为，偶尔看到报纸上有一个消息报导，某省文学界新春座谈，有的作家提出：现在文学界的

“当务之急是求生存”！

这涉及到作家是“官养”、“民养”、“自养”问题，作家和市场关系问题，如何看待文学作品的价值问题，文学作品是否商品，作家是否都要下海经商等等许多问题。

文章都还没发表哩，前两天突然又在一张报纸角落里看到一条消息：陕西省一个中年作家邹志安同志因病去世，报导中说，经文学报发表了消息，得到了许多杂志作家捐款，说明邹志安同志生前因病家庭很困难，他在养活全家六口人的负担下还坚持创作。我没有订文学报，所以不知道详情。

但我也记忆犹新，前不久我也是从报纸看到一个消息，说山东某一位青年女作家患白血病，希予以支援。我也寄去 100 元略表心意。可是，我还没拿到收据，报纸上报导她已经去世了。

我也想起来，去秋我到外地回来，从一堆文件中发现路遥同志去世的唁电，同时却也从一张报纸上看到，路遥生前生活如何俭朴，写作如何勤奋，而死后还欠债万元以上。

更使我感到震惊的，我参加全国政协教文委调查组到南方途中，听到了艾芜老作家去世的消息，刚回到北京的当天中午又听到沙汀老友去世的消息。

我和邹志安同志不认识，我记得大概是在1986年，我在北京文学杂志是看到他的一个短篇小说《支书下台唱大戏》，我觉得很好，就写了一篇：《真叫感人好戏》，送到人民日报发表了。以后也没有注意他发表了多少作品，直到见他去世的消息，才知道他是一位已有四百万字创作的作家。谁知道，这四百多万字中间，有多少是为了解决家庭负担而写的？

路遥同志我见过，我参加茅盾文学评奖委员会，读过他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但并不熟悉。我也很难想象他生活困难的情况。

我倒是比较熟悉艾芜、沙汀这两位老作家，他们算是我的前辈，也是三十年代的老战友，是中国文坛中各具特色，创作丰富，颇有成就的作家。他们三十年代时，既参加革命活动，又要以写作维持生活，我亲眼看到过他们贫困生活的情况。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后，他们才可以说，不是为了生存而创作了。

现在也还没有消息报导他们死后家庭还有什么困难。可是去年秋天文坛上也有很多同志听到过使人难以相信的消息，他们二位住医院很久，因四川省作协无钱付给医疗费，医院下令要两位老人限期出院。幸亏省委领导知道此事，拨款还了欠债。现在这两位老人突然先后去世，也真好象是表明他们真不愿太牵累公家了。

这些现象，应该认真思考一下了。

也许这是我的老观念，我认为，看一个国家或民族广大人民的文化素质，评价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成就和传统，真

正理解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和现实以及广大人民丰富复杂的各种心态、思想、感情、道德、伦理……主要应从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学宝库中去求索。

文学事业的兴旺发达，创作的繁荣，作家队伍的壮大，归根到底，是要建立一支如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祝辞所讲的：“理应受到党和人民的信赖，爱护和尊敬”的文艺队伍。

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我们可以说，对作家的要求很多、很高、很严，然而动辄无限上纲，搞大批判运动，对作家的信赖、爱护、尊敬却是太少了。至于在出版、稿酬、必要的福利、创作环境等等方面，就更缺少考虑。

14 大的报告曾指出：

精神文明重在建设。

而我认为，文化建设的根本，是要建设一支好队伍，应采取一切措施发现人才，培养、尊重人才，创造一种有利于人才辈出的环境和条件，促进各方面的人才能够充分发挥他们创作的艺术才能、积极性和创造性！

现在，严肃文学出书难，印数少，稿酬低；各地作家协会缺少经费，出杂志赔钱，学术、研究工作难以开展；有的地方作协专业作家每年只有 200 元旅差费，体验生活住不起一般招待所；有些作家“爬格子”，花几年时间，不抵一位歌星一两支歌曲的酬金……。

在这种情况下，呼唤作家“走向市场”、自由竞争，难怪有些作家敏感到“当务之急在于求生存”了。今天《人民日报》文艺评论版就发表了一篇短评《作家，爱惜自己吧》，呼吁作家“千万别马虎自己”。

而我觉得，作家因此要爱惜自己，更重要的还是社会和舆论应该好好研究一下：如何爱惜作家和文学事业，在商品